17.1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九〇年第二辑

国际法学家、教育家周鲠生　徐正榜　张琦
回忆国学大师黄侃　杨克平
吴国桢生平漫记　许有成
李先念到新洲涨渡湖抗日根据地　许恺景
中山舰的战斗历程　汪世喜
为民兴利——记樊口堤闸水利建设　金德桢
武汉市越剧团的创建和发展　金月楼
红楼的兴建与湖北咨议局　梁华平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HB2/40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九〇年第二辑

（总第四十辑）

一九九〇年六月

China

主　编：萧志华
副主编：刘通寓
编　辑：周士豪
　　朱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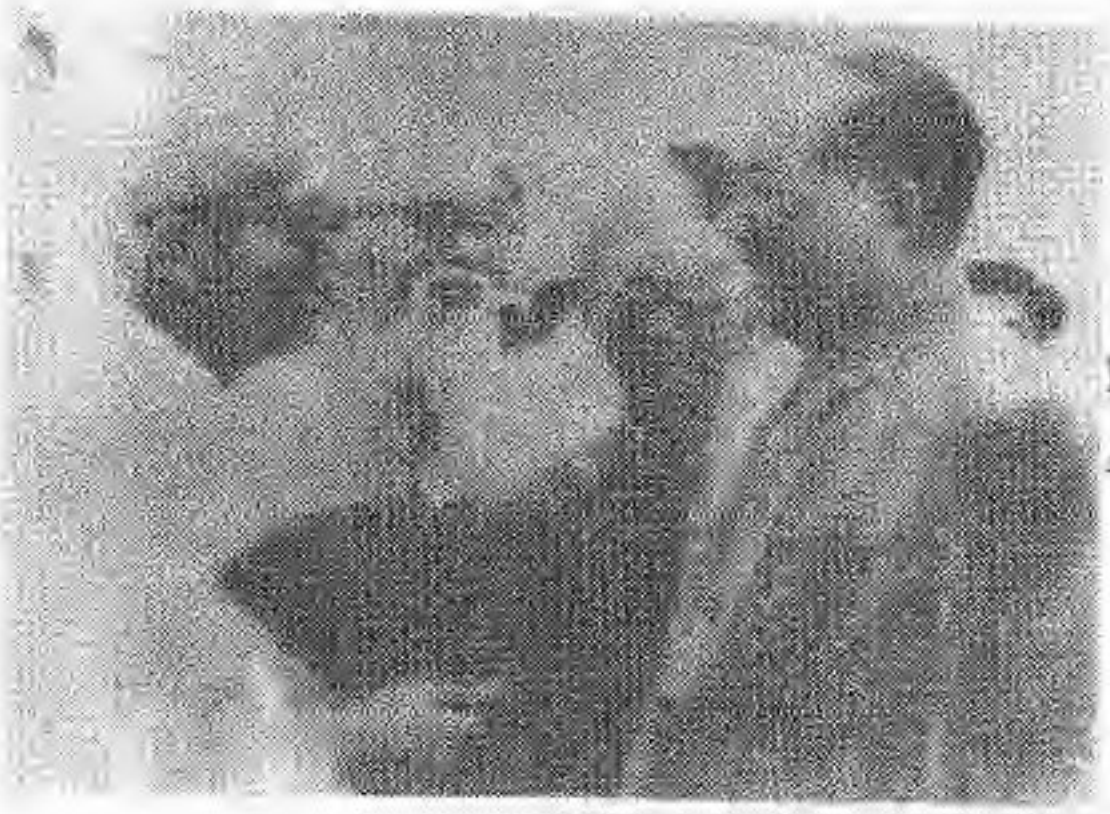
武汉文史资料（季刊）

1990年6月出版

出版：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发行：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
编辑：《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汉口沿江大道102号
印刷：国营湖北省新生印刷厂　　电话：22307
字数：165千字　　邮政编码：430014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广字01—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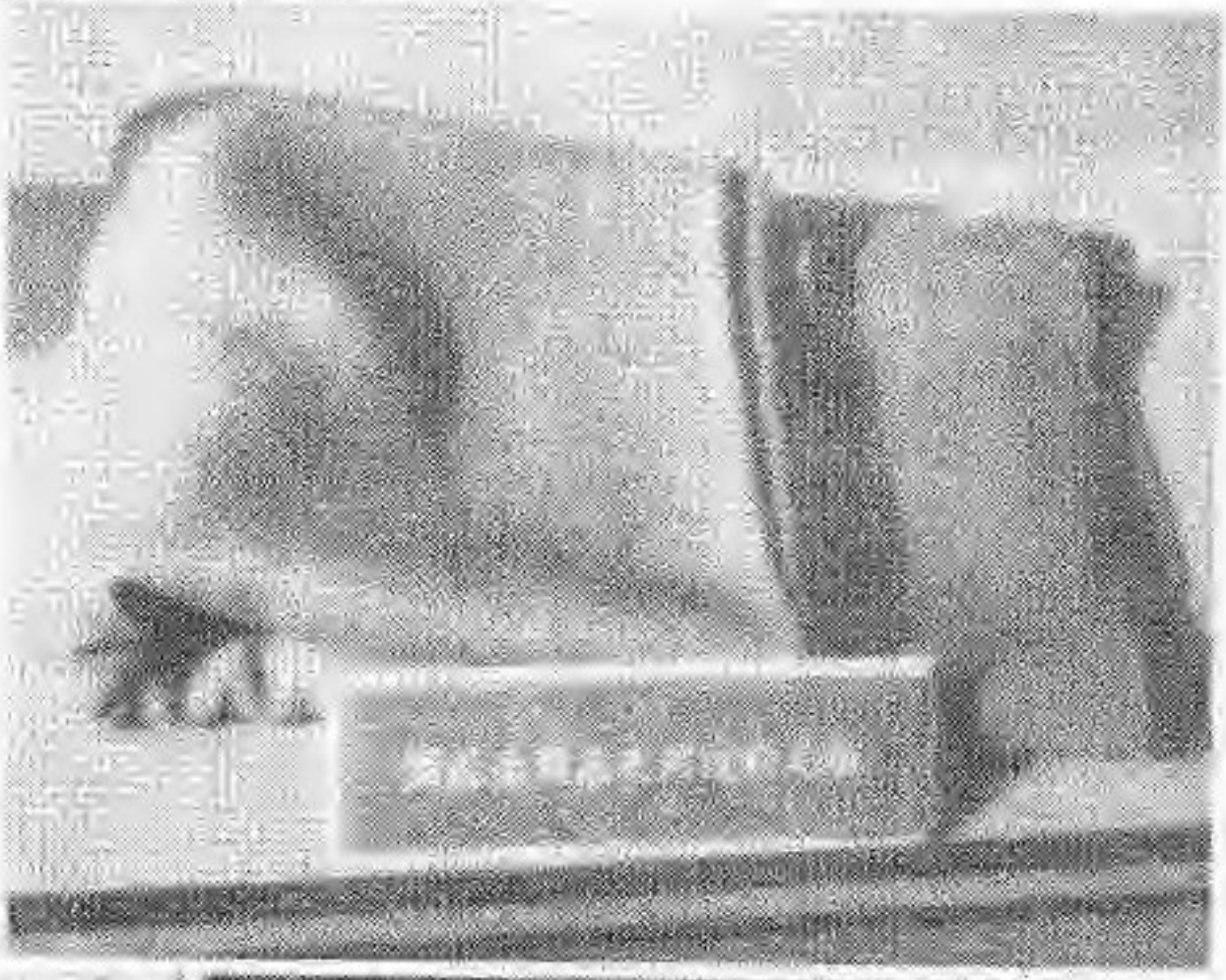
定价：1.80元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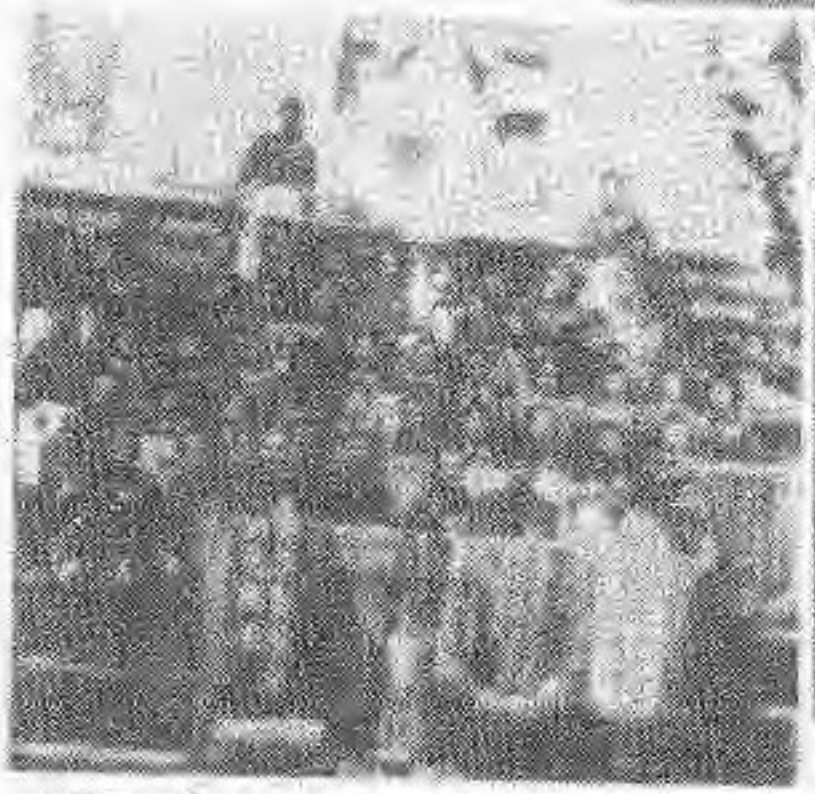
1949年新政协召开时，毛泽东与李书城（左一）亲切交谈。

（李乾三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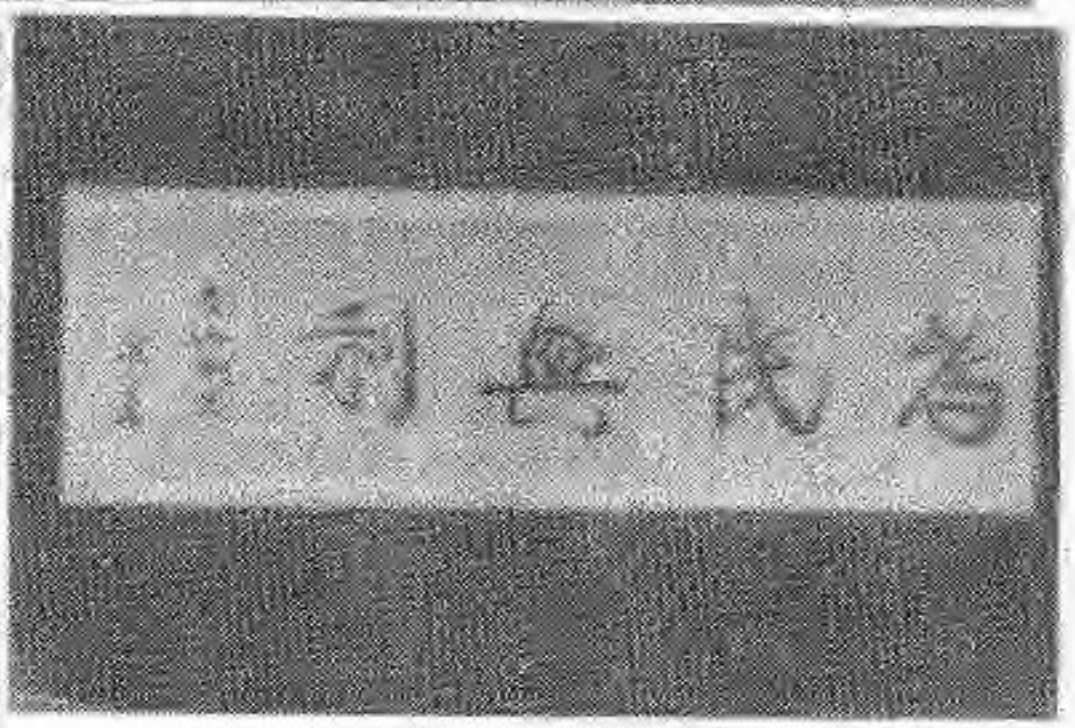
陈列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展览厅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使用过的毛毯

（吉上摄影）



1951年4月12日中南第一届篮球赛在武汉举行，武汉男篮获冠军，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领队陈先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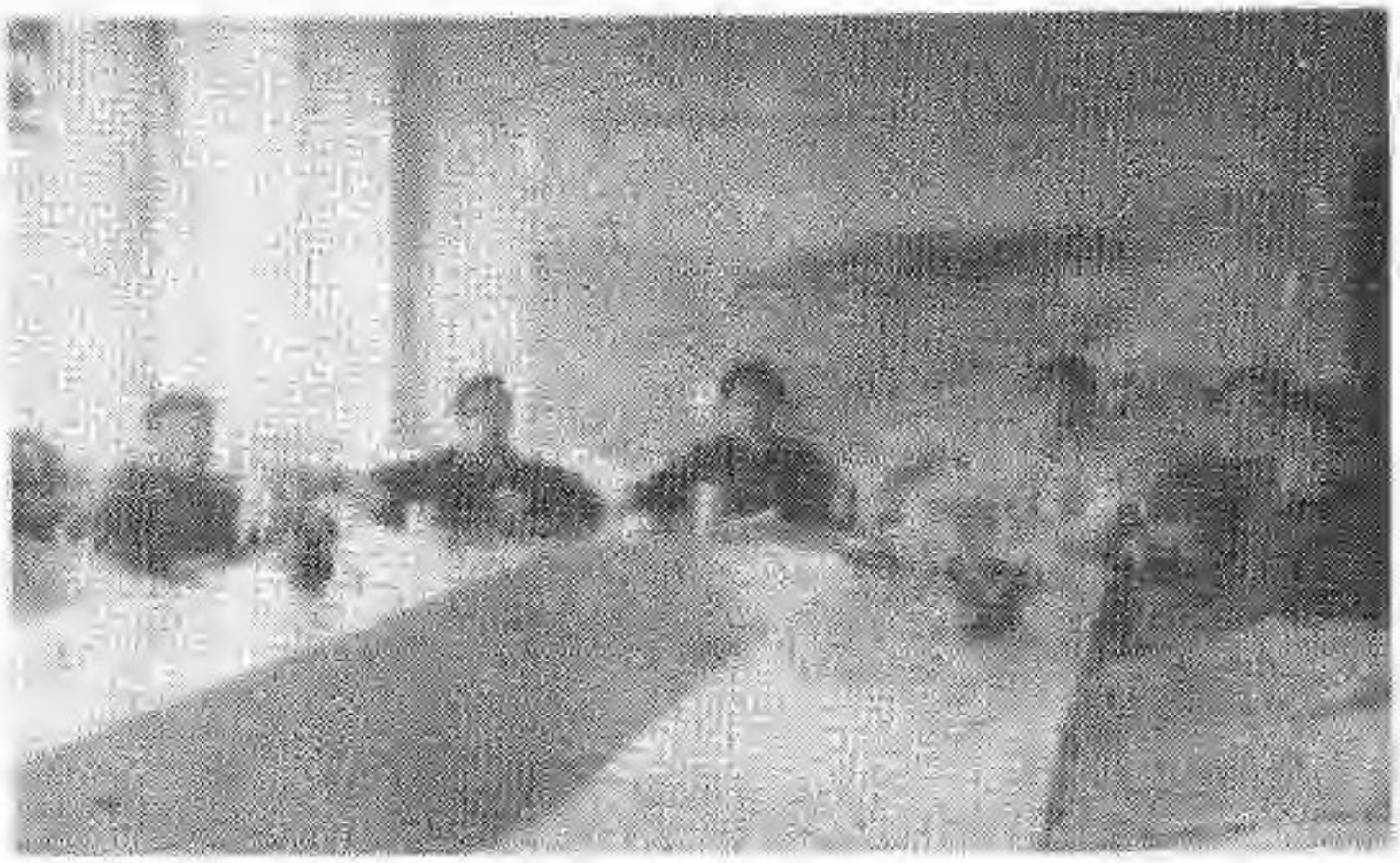
（屈彤供稿）



梁口堤水闸建成后，由康有为题字赠送给吴兆麟（芾三）先生

（益都城供稿）

China



现任石油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图片均由市石油公司供稿。



武汉市石油公司运输部



武汉市石油公司汉阳月湖水上加油站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九九〇年第二辑（总第四十辑）

秋春人物

国际法学家、教育家周鲠生 徐正榜 1
回忆国学大师黄侃 张琦
怀念鲍鼎老师 杨克平 12
记杨光第博士 卢国华 21
吴国桢生平漫记 陈剑函 25
徐复（佛）观的一生 许有成 32
我所知道的徐复观 李春初 56
话说贺国光 谈瀛 74
华觉明 87

抗战纪事

一条毛毯的故事 郑自夹 97
李先念到新洲涨渡湖抗日根据地 吉士
抗战初期在政治部的周恩来 许恺景 100
陈诚在武汉会战中 王彬 103
中山舰的战斗历程 孙宅巍 107
日伪军在汉拒降侧记 汪世喜 120
夏夔 127

武漢文史資料（季刊）

名人轶事		文化丛谈		科技史话		工商经济		沧桑篇	
李书城、徐特成与重大独家新闻	李乾三	武汉市越剧团的创建和发展	金月楼	五十年代初期的武汉市建业投资公司	金德桢	武汉进出口商的早期代表李国钦	唐庸章	红楼的兴建与湖北咨议局	梁华平
源华煤矿总经理陶公迪二三事	刘益衡	张静庐在武汉的出版活动	舒兴文	为民兴利——记樊口堤闸水利建设	黄懋胥	武汉的几家老药铺	金来刚		
林蔚经历片断	徐世江	追述武汉青年文化宫灯光球场	居彤	苏联测氡专家秋勃在武钢	柏钟扩	武汉市石油公司	丁隆昌		
				刺激神经疗法走向世界					
	139		155		169		192		203
	135		145		160		179		213
					174		195		198
	141								

国际法学家教育家周鲠生

徐正榜　张　琦

周鲠生教授，国际法学家，蜚声海外。周氏所著的《国际法大纲》及其他有关著作，不仅为国内各法学院、大专法学系科编写教材的依据和读物，且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指定为必备参考书。曾出国讲学6年。作为教育家，周氏先后到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执教，在武汉大学就当了8年教授、教务长，4年校长。

从孤儿到教授、学者

周鲠生，原名周览，1889年3月1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贫寒教书先生家庭。他4岁丧母，10岁丧父。幸其父生前深受家馆东主苏先烈（当时任长沙知府）的敬重，加上周览幼时天资聪颖，深得苏先烈的器重，才得以留在苏家家馆中继续伴读。无父无母、寄人篱下苦读了三个春秋之后，13岁的孤儿居然以文章名列榜首考取秀才，“神童周览”一时传为佳话。后来，谭延闿在长沙废科举，办新学，创立湖南省立第一小学（即湖南第一师范前身），并且亲任学监（即校长），周览是首批考取该校的年龄最小的学生。由于他先天营养不足，后天失调，靠微薄的官费读书，又无父母周济，常是衣不暖体，食不果腹，体质瘦弱，经常晕厥，然而他好学不懈，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文赛必得奖。周览虽然平日沉默寡言，但秉性耿直，在关键时刻，不畏权势，仗义直言。在一次抗议学校当局欺压学生的学潮中，因带头“闹事”，被谭延闿开除出校。然而谭又惜才，随又批准“才子周览”官费留日。

China

1906年，17岁的周览告别故乡只身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经济等学科。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览愤于清室腐朽，国弱民穷，一面发愤读书，一面积极投入反清活动，参加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组织的同盟会。

辛亥革命前，周览回国参加革命。在这期间，周览与出身湖南望族的黄芳君结为伉俪。黄家长辈明知周览是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孑然一身的清寒青年，但出于爱才，却托苏先烈和谭延闿为媒，将长女许配与他。周的夫人黄芳君，虽出身富贵人家，却贤惠能干，刚强开朗，婚后即离开富裕的娘家与周览自立门户，同甘共苦。她勤俭持家，因此使周览一生全无家累和后顾之忧，一心投入民主革命和教学、科研事业之中。周览婚后不久，即赶到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武汉，与李剑农、杨端六、皮宗石任凯南等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由于该报积极反对袁世凯称帝，报社遭到查封，编辑人员被通缉。周只身逃到上海，得到黄兴的支持和协助，并获湖南省官费，于1913年再度离开故国，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

在英国留学期间，周览改名周鲠生。在8年的欧洲留学日子里，他不仅取得了政治博士学位，而且获得一枚金质奖章。随后他又去法国深造，获得法国国际法学博士学位。

1921年，周鲠生从欧洲回国，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总编辑；第二年应蔡元培的邀请，赴北京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6年北伐开始后，他放弃北大教职，南下赶赴广州参加革命，后随北伐军来到武汉，旋又转至南京。南京政府成立时，他不愿当官，到东南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长蔡元培任命他和李四光、王星拱、刘树杞、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等人筹建国立武汉大学。随后他在武汉大学担任教授、法律系主任、政治系主任、教务长。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周鲠生的整个生活中，教授国际法、研究国际法占据了他的大半个生涯，他相继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教时，开出的课程有五六门。即使在他担任武大教务长和校长时，也从来未脱离教学工作，每周至少讲两小时课。由于他学识渊博，勤于钻研，他所用的教材都是他自己的著作和不断研究出的新成果，因此他的课堂里总是座无虚席，甚至窗外都挤满了学生。在1921年到1945年这二十几年里，周鲠生写出了十几本专著和上百篇重要学术论文，对培养我国政法界人才和推动该领域的学术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国际法大纲》一书曾经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国际法科的指定参考书。他的《赢得太平洋上的和平》一书1944年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国际法学界的兴趣和重视。

以国际法为武器宣传抗战

正当周鲠生和李四光、王星拱、刘树杞等人创办武汉大学稍有头绪之时，1931年9月传来了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消息，顿时，全校师生群情激愤，周鲠生在一次全校总理纪念周会上演讲，指斥政府不抵抗和退让的行径，认为不可相信美国能为中国说话，它出面调停的结果将对中国不利，并预料中日问题不是一时所能解决的，要求青年学生要做多方面的准备。随着日寇的侵略步步深入，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周鲠生以国际法为武器，积极站在宣传抗战的前列。

1932年，英国李顿爵士率领“国联调查团”来我国调查“九·一八”事变，某些团员偏袒日帝，说事变的发生起因于我国同胞抵制日货，是反日运动所造成的。周鲠生参与这次对调查团的谈话，他引经据法，结合实事，全团为之折服，为调查团后来撰写比较客观的报告，起了较好的作用。他在抗战中仅为武大师生演讲的讲稿已公开发表的不下30篇，现择其要者列之：《日本对华侵略政策》、《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国民对东省事件

China

应有之觉悟》、《东省事件怎样解决》、《国际调查团与国联委员会》、《国际裁军会议》、《东省事件之国际形势》、《东省事件的新局势》、《外交与国防》、《对日外交》、《中国与国联》、《欧洲政局与远东和平》、《时事报告》、《中国外交史之一页》、《外交之检讨》、《对日抗战中之外交》、《世界危机与中国》等。通览这些演讲稿的内容，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日本强盗无比愤恨，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爱。第二，对日斗争要讲究策略和斗争手段，充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世界舆论工具，牵制和打击日本。第三，预料中日战争的持久性和艰苦复杂性。第四，动员一切力量，不分阶级，团结一致，誓死抵抗，反对妥协投降。第五，抗战工作要艰苦踏实，应持多做少说主义。第六，深刻揭示中国被日本侵占的根源在于积弱太深。第七，强调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而战，同时也是为世界的正义和公理而战。他说："中国的抗战不过打了前锋而已。有人觉得这是傻事，我们还得知道，世界上伟大的事业，神圣使命，都非有几分傻气不能成功的。"第八，揭露美英参战的目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抗战中，周鲠生不仅运用国际法学到处演讲鼓励抗战，而且身体力行地组织民众抗战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1933年8月，他被选为武汉大学东省事件委员会委员，武大发出的抗战电文多出自他手。1939年5月，他参加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被推选为理事。同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出席在美国举行的旧金山会议。

迎难而上出任武大校长

1945年7月初，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议定调王星拱为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决定由周鲠生接任武大校长。周鲠生受任校长时，面临最紧迫的两大难题：第一，由于武

大进步力量强大，斗争激烈，被特务密告的人和事颇多，校长左右为难。第二，抗战胜利在即，迁校复员武昌成了当务之急。周鲠生对于第一个难题的态度是效法蔡元培先生，决不无故开除一个学生。然而第二，抗战期间的珞珈山校舍，先是被日军野战部队占用，后又为日军野战医院和文职官员霸占。日寇投降后，珞珈山校舍表面上看依然宏伟，然而校舍内部设施却被破坏无遗。师生员工急不可耐地盼望着东还珞珈山。东还与西迁相比较更为困难。一是学校人员增加了两倍以上，师生员工总数已达3290人，还有大量的图书档案、仪器设备要装运，仅公物就有939吨。加上物价上涨了两千倍，西迁乐山时仅用二万七千元（法币，下同），经过十年的货币贬值，东还珞珈山却要二十九亿二千万元；二是交通工具紧张，飞机、轮船等主要交通工具多为国民党行政官员和军队征用，学校复员只有靠木排和徒步。由于周鲠生校长的精心筹划安排，总算一个个地解决了。1946年3月10日，第一批物品从乐山启航，同年6月20日首批人员起程。师生们历尽艰辛，终于全部平安东还。1946于10月31日，先期达到珞珈山的师生在学校礼堂举行了“武大成立十八周年暨三十五年度开学典礼”。

此时，周鲠生校长立即着手恢复农学院和设立医学院的工作。武大农学院在抗战前已初具规模，西迁时奉命并入中央大学农学院。这次恢复，聘请叶雅各为筹备主任。早在1935年，武大在东湖磨山一带购置了5000多亩农田果园和林场。八年沦陷，大半荒芜，叶雅各主持了垦荒兴种修整，才使磨山林场重披绿装，到解放前夕，武大农学院已发展到农艺、森林、园艺、农化四个系。1946年10月，武大又着手设立医学院，聘任李宗恩（李为英国留学生，皇家医学会会员，抗战时任贵阳医学院院长）为筹备主任。医学院下设解剖学等18个学科，并在武昌东厂口设立附属医院，开办医护学校等。科学研究方面也出现活跃的好势头。在经费困

China

难的情况下，仍然创办和恢复了一度被停办的刊物。武大图书一向丰富，但是经过西迁东还的千里辗转，加上日寇敌机的轰炸破坏，损失严重，但在曾昭安教授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大清理，此时图书仍有154455册之多，为教学科研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武汉大学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得到国内外的称誉。1948年2月20日，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函告学校：英国牛津大学已认可武大毕业生在牛津之研究生地位，即武大毕业生前往牛津学习凭武大审查成绩即可入学。享有同等待遇的仅有北大、清华、南开、中央、浙大及协和医学院。1948年底，中央研究院选举1949年度院士时，武大曾选出九个候选人。随着武大学术地位的不断提高，学校对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

武大迁回珞珈山后，学校经费拮据。国民党为了打内战，一再紧缩教育经费。1947年3月24日，周鲠生校长在全校大会上报告说："学校经常费每月只有一千一百余万元，而1947年2月全校仅水电费一项就开支二千六百万元"。一个月全部费用还不敷水电开支，教学科研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加之当时物价继续上涨，1948年元月份校内人员乘车买票只要一万元，8月份就涨到六十万元。由此可知当时全国经济形势之混乱，也更看出周鲠生此时办学之艰难。

但是，周鲠生服膺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的办学精神，认定办好一个大学，首先要有优秀的师资。所以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摒除门户之见，宗派之别，不管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对于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专家，他都聘用。1939年到1945年，他在美国讲学期间，就十分注意在留学生中选拔人才。对选中的留学生总是亲自登门邀请。仅1945年到解放初，从美国留学生中应聘来武大的青年教授就达到50多人，如张培刚、韩德培等，使武大断老学者荟萃，人才济济。据统计，1948年武大教员297人，比1946年增

China

加近100人。其中教授134人，比1946年增加32人，副教授增加了26人。孟昭礼、李儒勉、周如松、陈遵、李剑农、韩德培、张培刚、吴保安、赵理海、许宗岳、陈翼枢、曾启新、赵国华、余家洵、石琢、林侔圣、方善桂、任华、吴宓、汪奠基、周辅成、韩家学、查谦、周金黄、桂质廷、高尚荫、曹诚克、黄培元、吕保维、鲁慕胜、陈华癸、李宗恩、袁浚、章文才等知名学者专家都是这个时期应周鲠生校长之邀请来到武大任教的。有一次北大校长胡适来武大讲学，看到武大积聚了这么多的年轻教授，十分感慨地对周鲠生说："你真配当大学校长，你很爱惜人才。"周鲠生不仅善于选拔和爱惜正规学校培养的学生，还特别爱惜自学成才的青年人。早在1933年他任武大教务长时，在全校作《考试与教育》的演讲时就对自学成才作了深刻的阐述，号召师生们摒除世俗的偏见，看重自学成才的青年。我国著名法学家李铁铮在他的《敝帚一把》中还详细地记述了周鲠生先生怎样引导他这个青年走上自学成才之路。

周鲠生不仅爱护人才，珍惜人才，而且还十分强调尊重人才。在他任武大教务长期间，恰逢武大开展纪念张镜澄教授执教20周年活动和1935年追悼已故前代校长刘树杞活动。按惯例，每当这些活动，全校师生有钱出钱，有物出物，各买些人参、银耳补品之类的物品以表对恩师和好友的敬意。周鲠生认为这种表敬意的时间不会长久，为了久远地志先生德业之盛，他和王星拱等倡议设立纪念奖金，既有利于志先生德业之盛，也有利于鼓励后之学者能继先生之志而有所造于斯学，较之鹿洞之碑，鹅湖勒石更有意义。

解放前维护"小解放区"

艰苦的八年抗战胜利了，周鲠生这位毕生为民主和平奋斗的同盟会员，满以为胜利后有个和平民主的境地施展他报效中华的

China

才干和决心。孰不知，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国内进一步推行他的独裁统治，对共产党、爱国人士和进步力量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1947年6月1日凌晨，国民党武汉行辕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学生宿舍，搜捕进步学生20多人，用国际上禁用的达姆弹枪杀了陈如丰、黄鸣岗、王志德三名学生，造成震动全国的“珞珈山六·一惨案”。当时周鲠生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参政会议，惨案发生后，闻讯后第二天即与教育部杭立武次长乘飞机赶回学校，处理一切。他临行前，往见蒋介石，蒋说他绝对未发布命令叫武装军警到武大逮捕师生。周一下飞机，立即组织师生抢救受伤的学生，同时约集十八名教授到武汉行辕保释被捕的师生。愤怒的学生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后，他担心学生再遭不测，立即电令回校。1948年，武大校内，中共地下党员十分活跃，社团林立，刊物众多，竞相宣传党的理论政策，武大有着“小解放区”之誉。周校长面对国民党军政界的非议，镇定自若，极力维护学生的进步活动。学生崔明山和文治平等因纪念“六一惨案”周年，编写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罪行的《血债》小册子，散发全国，触怒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于是，国民党或公开或秘密地逮捕进步学生，进行严酷审讯，大肆镇压学生运动。8月23日，武大进步学生杨照昭、吴心池二人“失踪”；24日进步学生唐正乾在学校附近被特务绑架；26日武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崔明山被特务从黄石新华水泥厂抓回武汉；同日上午，国民党武汉特刑庭首席检察官陈锡畴带着法警，堂而皇之来到武大，向周鲠生校长递送传票十八张，胁迫学校将崔明山、文治平等18名学生立即送武汉特刑庭受审。周鲠生校长不畏强暴，立即采取措施营救受审学生。他亲自召集法律系教师开会商讨对策，进行合法斗争，安排刘湛旺、姚梅镇等老律师担任传讯受审学生的辩护律师。派人派车护送学生出庭；出面与拘留所交涉，要求不得虐待在押学生。成立了以韩德培教授为主的

China

"法律顾问委员会"，准备正式开庭时，出庭为受审学生辩护。学校还多次拒绝敌人的无理要求，坚决抵制敌人就地逮捕学生。由于这次斗争有理、有利、有节，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18名受审学生全部安全脱险。国民党从武汉撤退前，白崇禧曾勒令武大提前放假并迁往广西桂林，遭到周鲠生校长的当面拒绝。为了保护学校，他始终十分镇静，一再向师生们表示："我一定坚持在学校，保护好学校，等待移交新来接管的人"。并指示学校后勤部门，多多储备粮食和日用品，以应急用。周鲠生是著名的学者，又是开明人士，此时他的一举一动，在稳定学校乃至社会秩序和护产护校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他60寿辰时，中共武大地下党组织发动全校师生为他祝寿，表彰他热心办教育的功绩，希望他对革命事业予以支持，为武大作出新贡献。

进入外交界多所贡献

1949年武汉解放前，周鲠生校长同进步师生一道反对迁校，积极开展护产护校斗争，为把武汉大学安全完整地交给新中国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鲠生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紧接着受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顾问，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

周鲠生是务实之士，但解放前他不当官、不从政，他的学问只是用在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事业上；而新中国刚成立，他却弃教从政，全心全意地到外交部当一名顾问。他和长大周如松教授谈心时才道出真底，他说："解放前我一直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研究，写过《不平等条约十讲》，作为小册子出版，那也只不过起着唤起青年人的爱国热忱的作用，没有实际成效。"解放后，他才真正将自己的学问付诸实践。

新中国诞生后，面对新生的中国蒸蒸日上之势，国内外反动

China

势力一刻也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或侵犯我国领空领海，或在祖国的大门口肆意骚扰破坏，或造谣惑众、欺骗世界，不一而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一名顾问的周鲠生，对此表示无限愤慨，经常为报刊撰写文章，进行无情的抨击和批驳。1959年印度军队入侵我国，他立即撰写《印度地图改画中印边界线是不合法的》、《国际法并不支持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等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用事实和国际公法回击入侵者，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而斗争。

与周老共事二十多年的外交部顾问、著名法学家李浩培教授回忆说："周鲠生先生在外交部任顾问期间，对我国重要的外交问题都按照国际法和我国外交政策，提出了很正确的处理意见，外交部和条约法律司的领导一般都采取他的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周先生都很重视，重要的外交文件，非经周先生提意见，周总理是不批发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偕同英国国际法专家沃尔多克（原牛津大学国际法教授，后任国际法院法官）来华交涉，周总理请周鲠生先生参加折冲。关于我国领海宽度和渤海湾作为我国领海（历史性海湾）的决定，毛主席也邀请周先生到北戴河商量后才作出。此外，针对我国的一些重要国际问题，周先生也写了文章公开发表以影响国际舆论。例如，关于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和印度侵犯我国边境问题，周先生都有在国际法上理由很充分的文章发表。"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颁布以前，党中央曾聘周鲠生为宪法起草工作的顾问，他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深为党中央领导同志所赞赏。沈德纯同志回忆说，周老对这次宪法的制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受知于周恩来总理

周鲠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有感于周恩来总理的推重、鼓励和支持，虽年逾古稀，仍然著书立说。1963年我国出版了他的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